

我们从《南京照相馆》看到了什么



《南京照相馆》海报。

■ 潘雨

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申奥导演的《南京照相馆》自7月25日在全国上映以来好评如潮。影片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的影像资料，故事聚焦大屠杀中南京城一家名为吉祥的照相馆，围绕记录日军暴行照片的“拍摄”“洗印”“存证”“运送”故事线，刻画了邮递员苏柳昌、日语翻译王广海、戏曲演员林毓秀、民国警察宋存义和照相馆老板金承宗一家在日军屠刀下可歌可泣的生存、反抗与守护故事。

影片触动人心的是它以普通人视角展开的平民抗战史与微观情感史叙事，导演申奥通过生动的群像塑造，让那些被历史湮没的鲜活生命得以被看见，让在战争中逝去的“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历史厚度与重量。可以说《南京照相馆》是近年来银幕鲜见的“于平凡处见微光”的优秀反法西斯电影作品。

平凡处见微光：镜头对准殊死一搏的普通人

历史不仅是精英的行动史，更是普通人的生存史和经验史。从平民史观回望整个抗日战争，正是这些大众的、日常的“人的历史”，证明它注定是一场正义的人民战争。为展现抗日战争中“人的历史”，《南京照相馆》从微观切进，叙事主体不再是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官兵，而是被日军屠戮的平民百姓。为“沉默的大多数”树碑立传，以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与坚守为故事核心，展现个体命运即历史记忆的家国同构关系，让《南京照相馆》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大历史与刻画中国百姓艰难求存的微历史之间交错有致、人物生动、主题鲜明。

反“符号化”的人物塑造。《南京照相馆》将镜头对准日军屠刀下挣扎求生的普通中国人，他们之中有沉稳内敛的青年，也有玩世不恭的翻译；有

见惯风月的伶人，也有为母则刚的妈妈……他们不是英雄，而是一群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当他们面临残酷的屠戮，也会自私、恐惧、犹豫甚至怯懦。然而正是这群充满弱点的普通人的背水一战与殊死一搏，才有了将日军南京大屠杀铁证公之于众的可能。小人物视角下的大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反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出来的历史。

刘昊然扮演的主人公苏柳昌原是一名邮递员，日军攻占南京时为了帮助一对老夫妻找寻女儿的信件错过上车时间。苏柳昌目睹卡车上的师父与逃难民众被炸身亡，苟活逃命的他在日军摄影师伊藤追问下谎称自己会冲印照片，自此开启了在吉祥照相馆洗印存证揭露日军暴行照片的一段传奇。

王传君扮演的日语翻译王广海是个骨子里卑躬屈膝、不相日本人人会战败的有奴性的中国人，当他琢磨出苏柳昌并非照相馆伙计，为了保全自己的演员情人林毓秀（高叶扮演）拿到通行证，利用日军摄影师伊藤不懂中文的语言错位，让苏柳昌李代桃僵，跟林毓秀假扮夫妻骗取证件。然而当伊藤撕下侵略者的伪善面具，将林毓秀交给日军长官随意处置，王广海目睹情人受辱，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抗冲动拼死保护林毓秀，最终惨死在伊藤的枪口之下。

《南京照相馆》中的小人物以具体的生命形态承载着大屠杀带来的灵魂与肉体的创伤和痛苦，他们在隐忍中爆发出来的坚韧不屈，最终铸就了中国人性格底色。

苦难叙事中的温暖力量。《南京照相馆》是一部以微观情感叙事见长的战争题材影片，这类题材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展现民族苦难的同时，不让人陷入纯粹的绝望。导演在影片的情绪节奏控制上手法独到，多处情感渲染的细节处理令人印象深刻。例如照相馆老板金承宗在妻子女儿抓阄拿到通行证即将逃离南京时，提议为大家拍张合影，离别的不舍与亲人即将逃脱绝境的喜悦让老人兴奋地拉下一幅背景幕布，幕布上北平紫禁城的庄严、杭州西湖柳浪闻莺的柔美、天津

战争题材的故事重点不在于一味渲染战争的罪恶，而是要通过在极端绝望的生存困境下对人性底线、人的尊严以及生存权的坚守，还原普通人民守相助的历史真实，进而呈现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真正的精神内核：邪恶永远无法泯灭人性的光辉。

导演借《南京照相馆》中的一众普通中国人，让他们在日军屠城的极端绝望困境中从陌生到熟悉，从相互试探到彼此信任，从保全自己到奋不顾身拯救他人，展现出微观情感叙事下的人性之光。

平民的抗日不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持枪作战，而在于他们对人性底线与良知的守护。

苦难叙事中的温暖力量。

《南京照相馆》通过宏大历史与个体命运的交织，以残酷战争与人性微光的碰撞，建构起复杂的多层次叙事关系与多重情感共鸣。

影片以情载史，以史传情，成为同类题材中的翘楚，也是今年夏天最值得一看的电影佳作。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处长、导演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时代需要怎样的“迷彩故事”

人的奋斗精神与家国情怀。如《龙腾东方——歼-10诞生记》，记录中国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斗机歼-10的全过程，从气动布局设计到铁鸟台试验，彰显航空人的智慧与坚韧。如《大国重器》，全景展现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史，首次揭秘战略导弹部队的许多历史细节，塑造了杨业功等英雄形象。还有书写老一辈科学家的作品，如黄传会的《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杨黎光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等，将作品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技术细节与人文关怀并重，还融合了跨学科知识，涉及航空、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报告文学作家们勇于挑战自己的认知界限，兼具科技素养与文学功底，把高科技当成文学富矿。

此外，近年来的军旅报告文学突破传统宣传模式，注重对军队现实问题的思考，并回归对军人个体价值的关注。

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作品主题同质化与宣传

化倾向，与强军实践存在一定脱节，对军事变革的反映不够深入，在重大题材把握上显得力有不逮，尤其凸显出科技素养薄弱、对新一代官兵精神世界认知不足等短板。与此同时，创作层面普遍存在着两种失衡现象：或是陷入“有报告无文学”的窠臼，细节刻画苍白无力；或是过度追求文学渲染，弱化了非虚构文本的真实性根基。更有甚者，部分作品停留在政论缺失的简单事实堆砌，或沦为新闻通讯式的应景之作，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在题材选择上，信息化作战、维和行动等现代化军事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展现，创作视野仍拘泥于传统战争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某些作品为追求戏剧效果随意虚构战场细节，或刻意回避军队改革中的深层矛盾，对军人家庭、退役军人等关联群体的关注更是付之阙如。

新闻性是报告文学之基，文学性是报告文学之本，政论性是报告文学之魂。这就要求创作者具备多维度的专业素养，着力扭转“重报告轻文学”

的创作倾向，摒弃复制粘贴式的粗制滥造，突破肤浅单调的写作定式。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文体自觉，在主题开掘上实现从“神化”到“人化”的转变；娴熟运用场景还原、细节特写等非虚构写作技法增强文本魅力；杜绝口号式表达，让精神内核通过真实故事自然流淌；正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展现强军征程的完整图景。要善于使用官兵看得懂的语言，用富于形象性、想象力且饱含情感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大胆借鉴吸收诗歌、散文、小说的语言艺术来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的语言。此外创作者还应深入班排、训练场、任务一线，深入了解军事发展前沿，拓展写作题材；要成为年轻官兵的朋友而不仅仅是“采访者”，要真诚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所忧、兴趣爱好、话语体系，捕捉青年官兵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使作品真正反映基层心声，充满时代气息和青春活力。

（作者系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 宋法刚

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如同中国当代的边塞诗，刻录着中华民族的风骨、气节和精神。那些真正动人的作品，总能令观众心潮澎湃。从《英雄儿女》中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王成，到《亮剑》中下令向妻子所在的城楼开炮的李云龙；从《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留给家人的沾满鲜血的欠账单，到《集结号》中谷子地给无名烈士墓戴上的洗净的头盔……这些人物和瞬间，勾勒出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担当与牺牲，打通了观众们“铭记历史、珍视当下、建设未来”的情感通道。

主旋律的新表达

得益于影视拍摄技术与后期制作水平的显著提升、产业链日趋成熟完善、群众对优质影视作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军旅题材影视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实现了颇有成效的创新。

一是拓展叙事空间。军旅题材的特殊性往往意味着不同的叙事空间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印记。随着创作越来越丰富，更多的陌生空间进入叙事视野，也有熟悉的空间被重新书写。

影视工作者近年来创作了一批如《明月几时有》《西北岁月》等丰富革命精神、联袂情感认同的优秀作品。例如《明月几时有》通过香港东江游击队在日军侵占时期对文化人士的救援，再现了香港热血激昂的抗战历史。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成为近年影视剧的热门题材。《金刚川》《长津湖》《志愿军》等实现了真正的“大投资、大场面、大情怀”。作品既有中美高层军方的宏大叙事，也有前线士兵的正面交锋，将国家命运的兴衰和个体生命的存亡都精巧融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

当下，中国军人的使命随着中国公民的全球步伐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其背后强烈的“故事性”也成为影视剧关注的重点话题。如《红海行动》将营救中国公民的行动放在了虚拟国家也门共和国，《战狼2》将营救行动放在非洲国家。这些作品在宏大的国际背景下生动诠释了中国军队保障海外公民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强大行动力与坚定决心。

二是强化类型融合。类型创作是影视产业体系下创作者和观众在市场磨合中达成的默契，类型元素的融合既有利于满足不同观众群体的口味，也能够消除特定观众的审美疲劳，是影视剧创新的常用手法，军旅题材影视剧也不例外。

最具成效的是“军旅+科幻”，代表作品是《流浪地球》系列。该片大量硬核科幻元素建构的影像奇观带来视听震撼，极具创意的科幻脑洞与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叙事体系共同赋予电影人文性思辨的深度与主体性思考的广度，二者融合为一种超越国家的影像话语，拓宽军旅题材影视剧的受众边界。

“军旅+喜剧”也是有效的类型融合。例如《铁道飞虎》结合故事情节需要，将大量喜剧类型技巧和现实中的“梗文化”融入电影文本，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幽默表达。

三是丰富创作手法。影像风格方面，《云霄之上》突破了以往画面造型的既定范式，在高度的美学自觉中将诗意熔铸于电影的影像时空，这样的影像风格并非抛弃现实战争的残酷性、盲目地追求视听造型的美感，而是在去主角光环、去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观念中，去表现一位位普通红军战士为革命牺牲之崇高、悲壮。

抗战“神剧”仍未根除

尽管军旅题材影视剧积极守正创新，取得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社会价值，但纵观其整体生态，仍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过度娱乐化”问题尚未根除。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发文，要求杜绝抗战“神剧”，摒弃“我方超人化、敌方弱智化”的剧情。虽然针对的是微短剧，但2013年时影视剧也因“手撕鬼子”等“过度娱乐化”现象被警告过，问题今天仍未根除。正常的娱乐是每个人的需要，但是部分资本为了经济利益，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刻意追求“奇观化”，弃人物行为、情节发展、细节呈现等常识和逻辑于不顾，不断突破“限度”，击穿“底线”。此类作品消解了题材的严肃性，解构了英雄的崇高性、扭曲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仅拉低了创作水平，还传播了错误的历史观。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管理部门的“把关”。首先要把“创作关”，要求影视公司杜绝“神剧”，按照规定对屡犯的进行警告、处罚。其次要把“审核关”，完善影视剧审查内容，除了审查意识形态、技术指标外，还要增加对基本的艺术元素合理性的审查，过滤掉明显不符合艺术基本要求的劣质产品。

“叫好不叫座”令人惋惜

当下，有的军旅题材影视剧在专业评价层面收获良好口碑，但市场平平，这一现象在电影中更加普遍，《守岛人》便是例证。深入探究，双重因素不容忽视：一方面是部分年轻观众基于过往经验，对军旅题材影视剧存有“只会说教”的刻板印象，因此敬而远之；另一方面是没有做好宣传发行。当今高度碎片化、圈层化的互联网传播格局下，“酒香也怕巷子深”。一些优质军旅题材影视剧的传统宣传发行模式显得力不从心，未能有效触达目标受众，未能将优秀口碑有效转化为市场动能。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抓住青年观众。内容制作层面亟需革新思维，要深入理解当代青年的表达方式与审美偏好，用他们喜欢的叙事节奏、情感表达和视听语言去传达情感、情操，从而消除隔阂，产生共情。《建军大业》就大胆使用有大流量和正能量的明星，加快情节节奏，突出士兵朝气，让青年观众进行自我投射，实现精神对标。其次，需要更新宣发理念，精耕融媒体矩阵和短视频平台，发挥算法积极作用，精准触达受众，加强针对性宣传、营销和发行，让口碑转化为吸引观众入场、驱动票房增长的生产力、竞争力和购买力。

要走出国门更要叩开心门

很多在国内市场不错、口碑良好的影视剧走不出国门，走不出国际市场，这一现象在军旅题材中更加普遍。除了审美偏好、文化折扣、宣发不力等共性原因外，军旅题材直面的战争（不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作为“政治的延续”，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下，自然不容易被战争另一方所接受；同时，我们战争的正义性及其政治合法性也不允许创作出违背历史事实、解构战争价值的类似美国《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者韩国《太极旗飘扬》等一类作品。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军旅题材影视剧的出海就没有突破的办法。

首先，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高度去审视战争伦理。我们的战士“能战”，不是“好战”，牺牲生命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实现和平。例如，《长津湖》中面对重伤的北极熊团团长麦克斯·伊安，伍千里为了阻止伍万里开枪，意味深长地说：“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充满人性光辉的亮点。

其次，丰富内容，讲述战争年代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救助难民的故事。例如《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黄石的孩子》等作品，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控诉战争扼杀的人性，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

最后，创新类型，通过“军旅+科幻”的类型融合（例如《流浪地球》）建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高位，在共同抵抗外来侵略或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让中国军人与百姓英雄并肩，让国家尊严与人类团结齐名。

可见，我们需要高超的智慧，在“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和“铭记战争是为了追求和平”的双重诉求中，既要弘扬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又要传递向上、向未来的理性思考；需要更多的可信、可爱、可敬的艺术形象共情人类的心灵脉动，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走出国门”从来不是空间意义的物理迁移，而是跨越国家的心理抵达。如果中国军旅题材影视剧能打动更多海外观众，完全可以成为沟通世界文明的桥梁和有效路径。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